

100
五
年
文
物
掠
夺



桂系文史資料第十一輯

90



20

6.09
1

YT35/26

前　　言

这辑文史资料，是记述清末以来的拓荒者在三江平原进行土地开发的艰辛历程和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前来掠夺土地资源、奴役贫苦农民的专辑，取名为《开发与掠夺》。

我三江平原有史以来就是中华大地的一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理学家说我国版图象一只昂首长鸣的雄鸡，而三江平原的位置恰恰属于鸡冠部位。这地方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粮豆满仓，厂矿林立，称得上一块繁荣昌盛的宝地。然而在历史上，它在“三座火山”的压榨下，处于窒息状态，单是土地开发的过程就极其缓慢。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一段，日本侵略者实行武装移民，入植了许许多多的“开拓团”，后期又实行“粮谷出荷”，大量抓派劳工，把早期拓荒者及其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有这些史实，都是我们当代人与后世人难以想象的。

在辑入本辑的史料中，有一些是由征集员、撰写员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得到的，可谓来之不易；有一些则是“三亲”人物的回忆，其内容就更为翔实。希望史学界人士和各界读者喜爱这辑史料，更希望这辑史料会激励广大读者热爱这块黑土地，为三江平原的进一步开发与建设做出无愧于历史的奉

献！

本辑史料的征集，得到了我市各县（市）、区政协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协作。在此，我们深致谢意。

——编 者

1989年12月

目 录

- 黑土地的坎坷 于济川(1)
- 荒原初飘稻谷香 难民怒火迎风起
——记朝鲜族难民在汤原开垦水田的斗争 金昌永(15)
- 沃土追昔
——访桦南县土龙山镇盖家屯 化雨(33)
- 兴东垦务公司纪略 李智明(51)
- 苏家店的来历 史淑英(58)
- 与张万库老人一席谈
——日本开拓团入殖及“粮谷出荷”侧记 李亚娟(62)
- 宝清县土地开发与老杨荣的回忆 刘广运、邹本德(67)
- 桦南县土地开发简史 李艺、苏来 (76)
- 历史的阴影
——日本开拓团遗迹在我国营农场 郑加真(81)
- 七虎力开拓团雇工话旧 戴国富(97)

领主与农奴

- 访小八浪开拓团的两位长工………董大为(115)
小博役眼中的万金山开拓团………化雨、董大为(123)
我家给“小大夫”当长工………孙井岩(132)
日本开拓团入侵汤原县始末………袁立新(141)
抚远土地上的血和泪………张基太(150)
湖南营垦荒与日本开拓团入侵………苏来(158)
日本强盗掠夺 穷苦农民遭殃
- 记李富一家在日伪统治下的遭遇……傅民(167)
“粮谷出荷”粮刮尽 饥死冻死又一家………
刘福口述、孙井岩整理(177)
“天津班”劳工的遭遇……李巨山等口述、高先峰整理(183)

黑土地的坎坷

于济川

(编者按：本文撰稿人于济川同志是黑龙江农垦总局《农垦工人》杂志特邀编辑。由于工作之便，他熟悉垦区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接受本刊约稿后特地搜集了口碑史料，为撰写本文充实了生动的内容。我们感觉这在三江平原土地早期开发和日本开拓团的掠夺方面，是一篇贯穿性的重要史料。由于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垦区，因而在地域范围上兼及我省其它地区，这里只能兼容并蓄，不便切割。)

内地人一谈起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即便是专家、学者，也往往存在一种抹不掉的传统印象，那就是：寒冷、荒漠、贫穷、落后。

历史上，由于这块地方距离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较远，历代统治者只在国力盈实时放宽施政尺寸，给些财政投资，以显示其统治的力度。而这种措施的行与止，又往往取决于边境防务的紧缓，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开发。

进入清代之后，从1736年到1858年，在122年的漫长岁月里，只准满洲八旗人在这里一条一块地“屯垦实边”，并且把早已流入或发遣而来的汉族农民也强令加入旗籍，使之

成为“随旗户”。清政府严禁汉人前来“私垦”，其理由是要保护清廷的“祖宗龙兴之地”。这地方大片的荒原沃野，就因而闲置起来，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清末时期，清政府对这里“开禁放垦”，沉睡了几千年的黑土地才开始苏醒。但是，它还是坎坷多难，步履维艰。记述这段史料，应能激励人们加紧开发建设，以繁荣祖国边疆的奋进之心。

（一）艰难坎坷的开发

1858年以后，帝俄的远东扩张主义政策给清政府造成了威胁，加上关内人民的武装起义屡屡发生，原驻黑龙江省境内的八旗士兵大部抽调南去，防务力量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又不得不把移民放垦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当时清王朝财政困难，需要以民垦收入弥补财政亏空。为此，清王朝终于放弃了封禁政策，实行“开禁放垦”。

然而，土地开发谈何容易。清政府只着眼于边防需要，又值府库空虚之时，无力资助垦荒事业；前来垦荒者多为饥民，其开垦也将是短期行为，谈不上农田基本建设。即便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从关内各省移来的农民有相当数量的增加（据有关资料记载：1884年，黑龙江只有25万人口，到1929年，已达370万，增加14.8倍），仍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而是同军阀战争、自然灾害相关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5年中，战争连年不断，关内农民为求生计，抛弃原来的田园，奔赴北大荒，也只求一时的生存，没有进行长远建设的能力。

中华民国成立后，曾有国内资本家同国外资本家，军阀巨户同江浙财团，互相联合，在三江平原搞过一段机械开荒的历史，其中以绥滨县境内的五大火犁公司为最。所谓五大火犁公司，即：东井公司、智远公司、广信公司、近思公司和美国人巴尔木办的火犁公司。这些火犁公司，全部在现今的绥滨农场境内。现在这个农场耕种的土地，很大部分是当年五大公司的弃耕地。据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土地处的资料：东井公司在现今绥滨农场的第八生产队，广信公司在该场第二十三生产队，智远公司在该场第二十二生产队，近思公司在该场场部附近，美国人的火犁公司在该场第二十生产队东部建设屯附近。五大公司从1925年到1927年，总共开荒十万亩。由于这些公司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权利之争，加上这些公司仰仗权势，对雇佣人员百般剥削压榨，引起工人的消极怠工，使耕种收获效益不佳。更重要的是，这些经营者的指导思想都是急于发财，因此对农田基本建设采取不投资的态度，对道路修筑、水利排灌、植物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等，一律不在考虑范围，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其它地方，如在桦南、汤原等县境内开办的几家垦植公司，也都先后夭折。

统治阶级对边境移民的生产活动不是以有计划的开发为目的，移民本身也只是为逃避战乱或灾荒，在新垦区没有永续利用的长远打算。在那种条件下，耕作极为粗放。据有关文献记载，农民对使用的土地“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别锄矣。”并且“不加粪溉”、“不加耕耘”。这样种地不养地，开了就种，不管单产多少，

只要有收成就行，一旦发现地力薄了，就马上撂荒，又去开垦别的地块，等于是一边开荒，一边撂地，只向土地要粮，不给土地养分，其结果自然是在开垦一些土地的同时，又把一些土地变成了“二荒地”。

在松嫩平原还有蒙族移民垦荒，其办法更为落后。据《龙沙记略》中记载：“蒙人耕种，岁易其地，得雨乃种，不雨则终不破土，故饥岁恒多。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布种则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这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进入的蒙族人的种地方法，几乎同游牧牲畜相似，找个水草好的地方，播下种子就走，一直等到秋天才回来收获，连草带粮一齐收。可想而知，此种耕作方式能有多少收获。

统治阶级的放荒屯垦政策，阴晴多变，是造成土地开发不能永续使用的直接原因。那时，在大荒原上，搞零星开荒，无任何农田基本建设可言，耕作仅三四年，漫岗丘陵地带水土迅速流失，低洼地带则变成泡泽，久而久之，盐咸板结。这样造成的恶果，至今仍能找到许多痕迹。

粗放的经营不需要科学技术与文化素养的保证，又造成了边境地区同内地之间的文化落差，对边防也没得到应有的加强。然而，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的黑土地倒是特别肥沃的，正如我们建国后从四面八方开来的垦荒大军所夸耀的那样，“掐一把冒油花儿”。因此，这地方早已被侵略者视如珍宝。而这个侵略者却已不再是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毗邻的帝俄，帝俄已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寿终正寝，换上了新生的苏维埃联邦新政权。

(二) 疯狂野蛮的掠夺

入侵三江平原与松嫩平原的侵略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是举世罕见的，而它的最严重的罪恶措施则是入殖移民。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殖民主义的炮制者小村寿太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福岛等人策划成立“满铁”时，就曾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

日本移民，是从南满开始，逐步扩展到北满黑龙江省境内的。据《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一书记载：“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总计有20万人，其中农业移民约2500户，6800余人，移民主要集中在南满各城镇，及铁路沿线。“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统治中国的目的，配合其军事侵略，采取多种方式，向黑龙江省移民。

首先是武装移民，即配有武器装备的移民，每入一支步枪，还配有迫机炮、机关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同时还有大量军警保护。他们从我国农民手中夺来土地，分给日本移民耕种。自1932年到1937年，先后五次武装移民(第六次改为集团移民)，总共移植2900户，计7296人，强占民田180万亩。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更大更狂妄的野心，炮制了一个20年内移民百万户、500万人的侵略计划。这一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占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核中国一垧六亩)。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还拟定了旨在加紧战争准备

与掠夺资源的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为保证移民侵略计划的实施，在日本国内和伪满政府内，相继设立了“海外拓务委员会”、“满洲拓殖会社”、“满洲拓殖股份公司”、“满鲜拓殖股份公司”、“满洲开拓会社”等等拓政机构。1939年10月22日，日伪当局制定出《满洲开拓政策要纲》，又根据这个《要纲》制定了一系列“开拓”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号称“开拓三法”。这些法令的核心是：稳定日本移民，企图使帝国主义的开拓组织真正成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到1940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各省共成立了89个集团移民区，其中69个在黑龙江省。

百万户移民计划第一期，目标原订的十万户，据《满洲开拓年鉴》记载，实际移入户是85,068户，其中包括“集团开拓民”、“集合开拓民”、“分散移民”、“铁道自警村移民”，以及“酪农移民”、“采金移民”、“林业移民”等等。

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大办“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招收16~19岁的日本青少年，进行为期三年的训练，然后组成“义勇开拓团”，进行移民。到1945年，义勇队训练生达86,500人，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243个。以上情况，是《满洲开拓年鉴》的记载，显然，这个记载在情节上有不切确的地方。记载说：所募集的青少年皆16~19岁，那么经为期三年的训练后，移民中国时，应该都在19~21岁左右。可是根据现今友谊农场老工人孙锡泉的回忆和1987年当年日本义勇开拓团成员访问中国，以及孙锡泉1988年去日本回访的实际情况，

证明《满洲开拓年鉴》的记载显然加大了青少年义勇开拓团成员的年龄。

孙锡泉回忆说：“1942年，我当时是16岁，因为家里穷，经常在富锦县三道岗村（现在友谊农场十分场）流浪，那年三道岗村开进一支日本开荒种田的队伍，叫‘阿无畏开拓团’，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会吹号，很快就认识了开拓团的司号员远藤正和，两人交了朋友。远藤见我到处流浪，就介绍我到开拓团打零杂。这些日本小孩连镰刀、锄头都不会使，随便把刀头和锄头套在把上，钉个钉子就开干，当然不好使，拧着劲，一天下来，手腕肿得老粗。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修整农具，磨镰刀，磨锄头，他们很感激，我也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时间一长，无话不说。他们向我学中国话，我也向他们学日语，后来就用两种语言搭配着说话，当时叫‘协和话’，基本能沟通双方的意思。他们对打仗的事很不满，说是天皇强迫他们来的，背后骂那些管他们的当官的。更多的是躲在一边哭泣，想家里的亲人，想日本家乡……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中最大的才15岁。”

以后的事实证明，孙锡泉的说法是真实的。1987年，当年开拓团的成员组织了“义勇开拓旅游团”来中国观光，一踏上中国土地就渴望到黑龙江省当年住过的地方寻找少年时期的中国朋友，在中国政府的热情帮助下，他们终于在友谊农场六分场九队找到了孙锡泉。儿时的朋友见面，实在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他们看到当年荒凉的大草原，今天已变成了现代化大农场，平坦的良田一望无际，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前来观光的当年义勇团成员，都比孙锡泉

小一两岁。按照孙锡泉的年龄推算，当年移民时，那些“义勇开拓团”的日本孩子只有十三四岁，而被迫训练时也只有十一二岁。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在移民侵略方面的惨无人道，不择手段。

这个观光团回国后，联络了当年的伙伴78人，联名邀请孙锡泉到日本作客，并寄来了飞机票，以表诚意。1988年10月20日，孙锡泉应邀到达日本，当年开拓团年令最大的仰木道之(15岁)，现在已是日本东京世界旅行社的总经理，率领当年开拓团的成员到机场迎接孙锡泉。孙锡泉在日本参观了当年的朋友开办的服装厂、制碗厂和都山市“中国残留孤儿学校”，还到老朋友佐伯方男的塑料大棚无土栽培蔬菜基地观光。佐伯方男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给孙锡泉技术和资金，帮助他在中国经营无土栽培蔬菜事业。孙锡泉在日本的活动，由日本《东京民报》和《福岛民报》作了报导。

日本侵略者，连十一二岁的孩子都强迫背井离乡，拓殖异国，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百万户移民在第二期计划实施期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但日本仍然作出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他们不但要完成原定的移民二十万户的计划，还要补齐第一期未完成的14,914户。按这个计划，在1942—1946年的五年内，总计移民要达到214,914户，其中义勇队13万人。但是他们发动的战争终归失败了，他们的移民计划也理所当然的彻底破产。

根据1943年《满洲开拓年鉴》的调查材料记载：日本移民入侵黑龙江省，各种类型的分布情况是：

集团开拓团，分布在35个县，包括：桦川、五常、宁安、勃利、绥棱、尚志、甘南、宝清、密山、庆安、龙江、阿城、虎林、铁力、富裕、巴彦、林口、讷河、北安、泰来、鹤立、汤原、依安、海伦、通河、克山、通北、方正、克东、延寿、木兰、德都、苇河、宾县、富锦。

集合开拓团，分布在21个县，包括：铁力、绥棱、桦川、依兰、汤原、鹤立、林口、密山、鸡宁、勃利、宁安、穆棱、阿城、尚志、五常、苇河、哈尔滨、呼兰、龙江、爱珲、通河。

义勇开拓团，分布在25个县，包括：富裕、讷河、甘南、通北、综索、铁力，庆安、德都，海伦、拜泉、克山、嫩江、桦川、汤原、林口、勃利、宝清、宁安、五常、肇州、肇东、安达、木兰、苇河、尚志。

其他，如“分散开拓团”、“铁路自警村”等，大部在北部地区。

从日本移民的分布情况看，他们明显地把30万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沿苏联边境一带、山林边缘地区和交通中心区，分作一、二、三线。这种分布表明，日本移民具有鲜明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目的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实行移民侵略的过程中，通过武力掠夺、廉价收买、强行驱逐、农地造成等方式，侵占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迫使大量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在一夕之间变成乞丐，拖儿带女，流浪乞讨，由于冻饿而死在山林道旁的数不胜数。

据曙光农场一位老工人回忆：当年他住在桦川县孟家岗

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孟家岗是桦川县属下的乡，而桦川县境内是日本开拓团汇聚的地方。孟家岗乡有许多村名都改称了日本名，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沿用日本人取的村名，如长野、保久等。孟家岗乡，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几乎全被日本开拓团夺去。那时候日本人打着“农地造成”的幌子，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熟地和可耕地，逼得中国人拖儿带女进入深山老林，挖个地窨子居住。孟家岗东南山沟里，有一片大约二里宽、十几里长的开阔地，这里老百姓叫它“大肚川”。被夺去土地的农民，许多都住在这条川里，地窨子沿着两旁的山根，隔不多远一个，人们就在自己的地窨子周围，开一小块地种土豆，等到土豆开花坐果后，就用镰刀把苗全部割去，为的是不让清山的日本兵和汉奸队发现，吃一点刨一点。冬天再挖一个窖，把土豆藏在窖里，以维持生命。一个人整年吃土豆，甭说粮食，连盐都没有，人人面色青黄，绝大多数人得了夜盲症，小孩长到四五岁还不会走道。

“大肚川”狼多，一到晚上，地窨子周围到处都有狼嚎，经常有小孩被狼叼走。有一个农民叫刘二汉，夫妻俩个到山上采蘑菇，把一个五岁的孩子留在地窨子里，地窨子门用几根元木摞起来，竖一块板子顶住，自以为保险。谁想到狼发现地窨子里有小孩哭声，就从地窨子的侧面掏个洞钻进去，把孩子叼走了。及至夫妻俩采蘑菇回来，不见了孩子，地窨子侧面开了洞，俩人象疯了似的分头去寻找。刘二汉向东，一直跑到“大肚川”尽头，也没找到踪迹。眼看天快黑了，他又想起同自己分头去找孩子的妻子，急忙往回返。他走有二里

多路，看见四个狼正撕着一个人大嚼；他躲在树后仔细观看，清楚地看见被撕吃的是个大人。他象疯了似的大喊大叫，那些狼只是抬起头，理也不理。这时，刘二汉不顾一切地边喊边往前跑。那些狼可能是已经吃饱了，竟然没来扑他，却慢条斯理地小跑着走开了。刘二汉跑过去一看，妻子的五脏已全部被掏出吃掉，手里还攥着一片孩子剩下的血衣！

老人说：那时候他在“大肚川”采黄岑，看到刘二汉几天不吃不喝，人们劝他，他象没听见一样。后来他疯了，跑出“大肚川”，冲进日本开拓团住的长野村，见什么就往嘴里填，学着狼的样儿嚼东西，后来被伪警察抓到八虎力，就再也没见到这个人……

讲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侵略战争的需要，而日本所谓开拓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掠夺。

从1939年起，日本殖民当局已经越来越感到粮食生产的迫切性。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无限度地扩大军队，除日本国内的青壮年和半老年几乎倾巢出动、黩武从军外，还在中国、朝鲜网罗纠集一些汉奸、游民，组成伪军、伪警以及名目繁多的武装。这些军队都需要粮食，而日本国内的精壮劳动力都已被征集入伍，哪还有人种地？所以国内很大一部分口粮也是由中国搜刮掠夺输入的，这样，粮食问题就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绞肠挂肚的问题。为了在殖民地扩大耕地面积，他们从1939年开始大量开荒。由伪满政府

投资成立了“满洲土地开发股份公司”，计划从1940年起，三年开荒1065万亩，开荒后的土地也作为日本移民用地。但执行结果，到1942年，只开出43.8万亩，连原计划的二十分之一都没完成。这还是所谓由国家投资的。至于省营开荒，更是微乎其微了。

（三）黑土地终于醒来

从整个黑龙江省的农业历史来看，从清末到民国这一阶段，是国内农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粗放开垦，“九·一八”事变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由于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者对黑龙江省的千里沃野的榨取和掠夺，造成了同内地比较的历史落差，阻碍了黑龙江省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而在日本投降以后，黑龙江省的黑土地终于苏醒过来。

黑龙江省是解放较早的省分，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从1946年到1947年，在全省展开了对封建制度最后一击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解放生产力、真正开发边疆的一个重要步骤。紧接着，就在变革了生产关系、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1947年，当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决定在黑龙江省创建社会主义国营农场。最早的示范性国营农场是宁安机械农场和通北机械农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香兰、孟家岗、桦南、绥滨等地也办起了国营农场，创业性的开发扩展到整个三江平原。

1956年，在黑龙江省的东北角上，出现了新兴的第一个